

不倦地追求

——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

(四编)

王益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王益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11

ISBN 7-302-09877-8

. 不... . 王... . 出版工作—文集 . G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380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孟繁陪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40×203 印张:4 字数:92千字

版 次: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9877-8/G·539

印 数:1~1500

定 价:15.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5-3103 或 (010)62795704

目 录

身世、经历	1
我的家世	2
我的家世补	5
初出茅庐时工作中的成绩与纰漏	6
我的入党和读书——为党的八十诞辰而作	8
我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差点儿成了国民党军官	11
84 自述	12
交 往 篇	15
有关陈毅的点滴回忆	16
回忆录：我与张春桥	19
我欠夏衍同志一笔账	20
井上英一其人其事	21
痛悼汤季宏同志	24
万国钧同志的最大优点	26
序 跋	27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序	28
《新华书店六十年纪事》序	32
为余德槐同志的书作序	34
《朱干文集》序	35

出版发行业务研讨	37
三审之外再加一审如何?	38
论图书不宜做广告的载体	40
日本出版大崩坏?!	42
出版社建立现代物流体系任重道远	53
应用型科研所发展的一条正确道路	55
“本版书”?“外版书”?	59
按需印刷是怎么一回事?	62
走马德、济、宁、常、沪书店印象记	65
《书友》连结读者心	68
读者抄书不应该?	70
不要“琵琶遮面”	71
微不足道?	73
妄自菲薄何时了?	76
妄自菲薄何时了??	78
中国是世界出版大国	80
大而化之,不知其可 ——兼论“从出书种数看,中国也是世界出版大国”.....	83
咬文嚼字说“分销”	85
少不得的“○”	87
如何降低图书的印制成本?	89
精神食粮也需要多样化	91
如何表述百分比的比较?	92
教材降价不能说降了一倍多	93
三联和新华是一家 ——为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 成立 15 周年纪念而作.....	94

创新和标新立异 96

出版史料和出版史研究的辩证关系 98

书畅其流话发行 99

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 105

新华书店杂忆..... 107

身世、经历

我的家世

家世,要从祖父谈起。我对祖父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在清朝,常州是府,我们无锡是县,无锡是常州府的属县。常州无锡关系密切。我家与常州显赫家族盛宣怀(又名盛杏荪,有“宫保”官衔)家关系很好。盛宣怀不知出了什么纰漏,我祖父替他把罪名顶了下来,免了祸,我祖父却从此做不得官了。盛为报答补偿起见,让我祖父当了苏州电报局长、杭州船政局长。这两个局长都是肥缺。现在一个县的电报局长是一个一般的公务员,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差使。当时全国只有苏州有一个电报局,不是民用的,是与皇家通消息的,是朝廷的耳目。差使不是官,当不得官的人,可以做差使。

我的大伯父是一个公子哥儿,住在妓院里做生意。地主做生意是当时的时尚。公子哥儿怎么会做生意?于是把我们家的地产都赔光了。我家从有许多地产的大地主跌落为没有一亩地的破落乡绅。没有一亩地了,但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的声势还在。

二伯父是一个中医,年轻时就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寡妇。

我父亲是三房,清朝的拔贡,比一般贡生高一点,比秀才高一级,比举人低一级。军阀统治时代,在江苏省教育厅任科员。待遇很高,除供他自己吃鸦片和花很多钱买彩票挥霍外,每月还能汇到家里 30 元大洋供七口之家家用。国民党北伐后,军阀统治结束,父亲失业了。坐吃山空,靠典当度日。几年下来,吃尽

当光,生活变得很狼狈,有时竟揭不开锅。

我的四叔父王西神,是我国著名书法家。靠卖字收入,在上海真如自建房屋,办了一个正风文学院,以弘扬“国粹”为职志。他家生活阔绰。我解放前在上海过流浪生活时,很少到他家去,因为我不喜欢趋炎附势。

我的两个舅父都是早年美国留学生。一个舅父是硕士,年轻时就去世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的经济学专著;另一个舅父是无锡荣家的女婿、荣毅仁的姐夫,曾任省立常州中学校长。在无锡住在一所花园洋房中,给荣家看房子。

我的姨父是江阴的大地主,为躲农民造反,租房子住在无锡避难。

穷则思变。我父亲失业后,大哥到荣氏系统的面粉厂当了职员,二哥寄居在四叔家当附庸。姊姊出嫁,家里吃饭人少了,日子就好过起来。

我初中上学,学费由族产收入补贴。上高中,不补贴了。第一学年,学费欠着。我卖掉了一部书稿,得了70元稿费,才还了债。第二学年,国民党逼我自首,我逃亡上海。上不了学了,也没有学费问题了。

到上海后,从此自食其力、自谋生活,考进生活书店当了练习生。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国民党逼我自首,同时被逼的还有一位我的同学、好朋友。他没有逃跑,因为他哥哥答应供他读书到大学毕业。他自首了没有我不知道,但他从此不跟我联系了,“文化大革命”中投昆明湖自杀了。

我的家世,看来不像是孕育共产党员的温床,但共产党员却在我们家确实产生了。这是有原因的,外因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帝国主义万万没有想到,侵略中

国,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开辟了道路,把广大群众推向了党的怀抱。内因是,我的觉悟提高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虽然在白色恐怖下参加共产党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我无可选择,豁出去了。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1月8日)

我的家世补

年纪老了,做事和写东西,常常丢三落四。我写过一篇《我的家世》,现在受别人写的文章的启发,觉得有补充的必要。

我的叔父王西神(蕴章),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他是我国著名书法家。其实,他还是一个文学家。商务印书馆曾聘他任《小说月报》主编。他不是鸳鸯蝴蝶派,属礼拜六派,“五四”以后,商务与时俱进,把他换了下来,由沈雁冰(茅盾)接替。我叔父也是《辞源》的编者之一。

清朝政府曾派我父亲和鲁迅等人一起去日本留学。回国后,鲁迅声誉日隆,我父亲却毫无敬佩之意。他对鲁迅的评价是“徒有虚名”。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人。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3月14日)

初出茅庐时工作中的成绩与纰漏

我一辈子做出版工作。出版工作,一般可以分三部分:编、印、发。印、发可以归成一类。出版工作也可以分成两部分:编辑和经营管理。我和叶籁士同志在山东新华书店任经理时,有明确分工,叶管编辑工作,我搞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是为编辑工作服务的,这点也很明确。

我搞经营管理,曾有过很耀眼的成绩。1938年,日寇快要进入广州,在广州的三家进步书店面临撤退的任务,撤退到梧州去。我们的书店是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思想的书店,不撤退不行。我在广州工作只10个月,不到1年。我意识到在广州工作,必须会说广州话,我也善于学广州话。离开广州时,一位广东朋友称赞我的广州话为“好白嘅”,意思很地道,这是一句恭维话,我讲的广州话人家能听懂了。在广州撤退时,由于我讲的广州话还可以,全部存书都撤走了,没有损失。读书出版社,跟我一起行动,也没有受损失。生活书店不同,受了很大损失。撤退损失,与会不会讲广州话有什么关系?当时的广州人,基本上没有人会讲普通话,与广州人打交道,必须会听会讲广州话。广州撤退时,由于我能讲广州话,说服一个广东船老板,和我们一起撤退梧州。他原来不想撤退,广州梧州是逆水行舟,要拉纤很辛苦。我当时正打摆子,躲在家里防空,不得不把我叫去。我用广州话说服了他,安全地撤退到了梧州。这是我初出茅庐时的一个成绩。

我搞经营管理,出了两项纰漏。一次是,一个蒋姓会计,平日生活俭朴,却迷恋赌博,趁我不在家时,到赌场去赌博,把书店的钱输个精光。一次是委托一家报社代我买纸,纸存在报社,等候机会运往汉口。当时广州和汉口的纸价悬殊,汉口纸价比广州高,纸运到汉口可以赚很多钱,当时粤汉路运输紧张,纸运往汉口要排队。好不容易等到可以把纸运往汉口了,存在报社的纸却被报社的人卖掉了很大一部分,造成很大损失。这两次纰漏不是由于我有私心杂念而造成。蒋姓会计是从浙江新知书店调来的,与我非亲非故,没再受牵连。

解放初期,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中,全国新华书店,在农村发行中,有强迫摊派的错误,我作为领导,作了检讨。

出了那么多纰漏,但总的来说,我在书店工作的表现,可能是三七开,功大于过吧,否则我在书店站不住脚。

我的入党和读书

——为党的八十诞辰而作

1934年,国民党无锡县党部,逼我填《共产党员自首书》。我当时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我怎么能填《共产党员自首书》?填《共产党员自首书》就等于背叛党,我怎么能背叛党?但当时国民党无锡县党部却逼得很紧,先是传讯我,把我叫去训话,发给我空白的《共产党员自首书》让我填。我不填,就让我把它带回家,想好后再填。我仍不填,就派特务来纠缠,三天两头要我交出《自首书》。我当时正在读高中,不愿抛弃学业,采取拖延战术。后来他们对我说,再不交出《自首书》,就“不客气”了。我知道拖不下去了,再不填,就要逮捕我。我不得不在这年的10月,带着空白的《自首书》,逃往上海,把它交给了我认识的共产党员。在此之前,我的好朋友孙佐凯,与我同样情况,既非共产党员也非共青团员,也因国民党勒逼填《自首书》逃往上海。逃跑之前,他对我说,如果在无锡站不住脚,可以到上海去,生活总是有办法的。有了这样一句话,我才会往上海跑。这时我的年龄是16岁10个月,离17岁还差两个月。

国民党逼我填《自首书》,也不是没有些许因由。当时我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思想,对党也有一点认识,与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有联系,做了些出版刊物和在墙上写革命标语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进步青年。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党团组织常常受破坏,被捕以后有些人往往“自首”。在共青团县委书记征求我意见,希望我入团时,我表示暂不入团。与共青团县委书记联系上不

久,他就被捕了,供出了我,但也如实地说明我并未入团。国民党不管这些,却要我作为共产党员“自首”。他们这样做,有两层用意:如果我“自首”了,党就不再要我了,可以把我与党隔开;二是为了邀功,他们把逼我“自首”称为“肃反”,如果我“自首”了,是“肃反有功”。实际上,国民党这样做蠢得很,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把进步青年往党的怀抱中推,逼上梁山。

逃到上海后,我加入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武装自卫会。它是党的群众性外围组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辞海》中找不到这条目,《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提到它,建国后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中提到它,姚依林逝世后发表的生平介绍中提到它。这个组织符合我当时的觉悟水平。国民党对它同样也要抓人的,我加入后没几个月,我们的小组长就被捕了,我侥幸没被捕。

上海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后,有一段时间,上海几乎很难找到党。1937年抗战前夕,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才逐渐地把党组织恢复起来。1937年底,华应申告诉我,他已找到党,他想恢复党的关系。他说我已具备入党条件,可以申请入党。我认为我对党的认识很幼稚,不宜马上入党,还需要努力学习。应申没有催我。1938年我调往广州工作,在广州人生地不熟,与广州地下党没有任何联系。在此期间,我读了一些关于党的书。主要读了《论共产党》。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厚厚一册,几百页,是收集摘录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可能还有张闻天)有关党的论述编辑而成。原原本本,原汁原味,读来非常得益。我对党有了比较全面明确的理解,我决定申请入党。在书店工作,书很多,是读书的有利条件。光有书,还不是读书的充足条件,读书还必须要有时间。我一直忙忙碌碌,没有读这本书。1938年广州沦陷,从广州经梧州撤退到桂林。从梧州到桂林走水路,逆水行舟,一天才走几十里。我在船上呆了十几天,仔细地读了这本书。入

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入了党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遵守党章党纪,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必要时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所以必须对党有全面深刻的认识。1939年1月,回到上海,我申请入党,得到批准。入党介绍人孙冶方在批准我入党的支部会上说,王益受党的教育多年,已符合入党条件,不需要后补期了,并指定我担任党小组组长。他还指出了我认识上的不足之处:在入党申请书上没有写“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的入党申请书是我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党的最低纲领,紧紧地吸引了我;对共产主义制度,我认为是遥远的事,写不写都可以。当时不了解,有或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大不一样的。

我在国民党“封”我为共产党员四年之后,读了一些书,才申请入党。书读得不够,因此入党申请书都写不好,严格讲,它是不合格的。

(原载《出版科学》2001年第3期)

我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差点儿成了国民党军官

我有一个堂兄名王赓,早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该校是美国政府培养高级军官的场所。西点毕业后回国,在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系统的御用军队税警团任主要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曾作为团长,代表中国,出席盟国(美英中苏四国)在开罗举行的高级军事会议。1933年,他动员我参加国民党空军。国民党对空军很重视,待遇很高,其成员一般不向社会公开招收,须有高级官员举荐。我当时虚岁18,思想已“左倾”,对国民党印象不佳,不愿与它发生任何瓜葛,但不便实话实说。我推说身体较弱,且已戴近视眼镜,不宜当空军。他说,不要紧,可以搞地勤。参加空军须到杭州岷桥空军基地考试,我说我没有路费,他说路费由他负责,可以给我100银元。由于我实在不愿去,拖拖拉拉,一直不动身,他也不再催,此事就不了了之,成为我历史上一个小插曲。当时他共推荐两人,另一个人也是我堂兄弟。他去了,被录取了,当上了飞行员;飞行员一般是尉级军官,后来他参加了“剿共”战争和抗日战争。人生好像一盘棋,不能走错一步。有时走错一步,满盘皆输。我这一步没有走错。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8月6日)

84 自述

一般同志写“80 自述”，因为 80 是高龄了，而且是一个整数。我现已 84 岁，错过了那年头，就写“84 自述”吧。

我有点早熟。1934 年，我还未满 17 岁，国民党逼我自首，要抓我，我不得不中断了学业，逃往上海。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武装自卫会。这是我参加革命的开始。

革命使我受到的学校教育太少，高中 3 年没有读满一半，影响了我日后不能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我开始出版工作生涯，是去生活书店当练习生，不是出于自觉，是为了找一个啖饭之地。进了出版工作的门，觉得出版工作很有意义，值得全身心投入，为之奋斗终生。我一辈子没有见异思迁，没有跳槽改行。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灵魂，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我自知力不能逮，基本上没有敢做编辑工作。即使我在领导岗位当一把手，管编辑工作的同志当二把手，我也尊重编辑工作。我给编辑工作当后勤，为做好编辑工作创造条件，为编辑工作服务。我自认为是出版业中的经营管理人员，管理印刷、发行等工作，但却围绕着编辑工作转。有时也看看稿子，参与一些编辑工作。

即使是经营管理工作，我也总觉得工作没有做好。我老是东打听、西打听“哪里工作做得好”，然后我就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